

# 周秦儒法斗争八题

(下)

屈守元

## 五 商鞅在秦的变法斗争

吴起变法所取得的成效，为二十年后商鞅变法开创了道路①。战国中期的政治活动家把吴起、商鞅相提并论，高度评价他们“明法令，禁奸本”，“罢无能，废无用”，“霸主强国”，“攘地千里”的功绩；叹惜他们“致功而不见德”，“名可法而身死②”。这种吴、商并列的评价表明：当时人就把商鞅变法看作是吴起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和吴起一样，都是卫国人，也都在魏国作过官。商鞅“少好刑名之学③”，在魏国受到李悝、吴起的影响：李悝撰写的《法经》，他“受之以相秦④”；而他在秦变法之初徙木以示信，则是仿照吴起取小亭的作法⑤。在魏国，向魏惠王建议不用商鞅就该把他杀掉的那个公叔痤⑥，就是陷害吴起，把吴起逼往楚国的公叔⑦。商鞅在魏国的遭遇，与吴起有些相似。

商鞅变法，在总结李悝、吴起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规模远比他们大得多。“开阡陌”、“置令丞⑧”，“燔诗书”、“明法令⑨”。变法内容，从经济基础，到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接触到了。十年光景，就取得了“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⑩”的成效。西汉末年校理国家收藏书籍的刘向（公元前77——前6年）、刘歆（？——23年）父子，本来是反对商鞅的，但对商鞅变法成就，也无法抹杀，他们说：“商君极身无二虑，

---

已。疏：粗浅。⑩天年：短命。遇：指得到皇帝信任。⑪今传本《贾子新书》五十六篇，比汉人见到的少两篇。贾谊的著作，除《贾子新书》外，这篇传文里载有《吊屈原赋》、《服鸟赋》（又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及《文选》）、《陈政事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王淮南诸子疏》五篇；另有《惜誓》（见《楚辞》）、《论积贮疏》、《谏除盗铸钱令疏》（以上两篇见《汉书·食货志》）、《过秦论》（见《文选》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等，都收入《全汉文》（清人严可均辑）卷十五、十六两卷中。⑫撮（音多）：采辑。著：附，载。

### 【今译】

赞语说：刘向指出，贾谊论述夏、商、周三代同秦治乱兴衰的道理，那些看法十分高明，通晓国家政治，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高出多少。假设当时贾谊能被任用，功业教化一定突出。但为庸臣们嫉妒，很是使人惋惜啊。回顾汉文帝不事吹播，身体力行，移风易俗的事迹，贾谊的建议是大体上都被采用了的。至于他打算更改制度，认为汉是土德，尚黄色，数用五；以及希望被试用为典属国，采用五饵、三表的办法去对付匈奴，这种办法的确是太粗浅了。贾谊年轻早死，虽然没有升到公、卿之位，但不能说是不走运啊。他的著作总计有五十八篇，现在采择其切合当时国事的部分言论附载于传文中。

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①。’”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说，商鞅变法“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刘向、刘歆的评论，出自反对者之口，可见事实昭然，无可否认。

商鞅变法为秦始皇建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基础。荀况弟子李斯在继荀况讲“四世有胜”以后，就曾向秦始皇说：“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②。”荀况、李斯把秦的胜利托始于孝公，归功于商鞅，对商鞅变法与秦统一事业完成的关系作了正确的理解。荀况的另一个弟子韩非曾把吴起、商鞅在楚、秦变法的情况作过比较，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③。”这就是指秦在孝公以后尽管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仍然很激烈，但基本上执行了商鞅那条正确路线，所以很快就把变法较早、但不坚持吴起路线而致削乱的楚国抛在后面，建成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商鞅虽然身遭车裂之祸，但他变法的历史意义及影响，却是十分重大的。

商鞅变法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不是偶然的。除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那个时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总趋势外，还应该注意秦的特点。秦在周初虽被斥为“西戎”，但周室东迁（公元前770年）以后，即据有西周旧京一带农业生产比较先进的区域④。这个区域里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很激烈。《诗经·秦风》的《黄鸟》，反映了奴隶们对野蛮的殉葬制度的愤怒谴责，表现了秦地人民的反抗精神。春秋时代，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起义，就在秦地建立过根据地⑤。在奴隶们的反抗、起义威胁下，秦孝公不得不考虑秦国的政治道路。“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穆）公之业”，就是他在新形势下要致力于“强国之术⑥”的措施。商鞅变法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比较适应秦地人民的要求，所以“秦民便之⑦”，这就是变法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一场进步与倒退的激烈斗争。抗拒变法的反动势力，有奴隶主贵族的保守派，特别是有儒家的破坏活动。“孔子西行不到秦⑧”，这对秦王朝封建统一政权的建立是一个有利条件，但不能说孔丘的反动思想影响就没有进入秦国。荀况对范雎说：秦“其殆无儒邪⑨”？理解这句话，应当注意荀况对“儒”已作了“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⑩”的区别。他所指的“无儒”，不是没有“略法先王”，“缪学杂举”的“俗儒”；而是没有“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的“大儒”和“法后王、一制度”、“尊贤畏法”的“雅儒”。他认为秦国还缺少这种名儒实法的人物，所以用“其殆无儒邪”这种疑问语气来强调有“大儒”、“雅儒”的重要。至于“俗儒”，在那个时代几乎无孔不钻，荀况怎么会怀疑秦国有无这样的儒者呢？事实上，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建成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的每一次进步运动，死抱住腐朽奴隶制不放的儒家（即荀况所说的“俗儒”）都是跳出来反对了的。

今本《商子》的第一篇《更法》，记载了商鞅回击甘龙、杜挚反对变法的谬论⑪。甘龙、杜挚在秦孝公刚和商鞅计议变法的时候，就跳出来反对，说什么“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种种胡说八道，不正是孔丘“仍旧贯⑫”、“述而不作⑬”那一路货色吗？不管甘龙、杜挚是否就算儒家⑭，但他们抗拒变法的反动言论，确实是从儒家破旧武库里搬出来的。在这个是变革还是保守、是进步还是倒退的关键时刻，甘龙、杜挚同商鞅的较量，尖锐地反映了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商鞅相秦十年，变法的成效已十分显著。一方面是“秦民大悦”；另一方面却是“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正当这矛盾尖锐化的紧要关头，儒家又猖狂地发动一次反攻倒算，代表人

物就是那个吹捧孔丘、称引《诗》《书》的赵良<sup>②5</sup>。赵良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此来攻击商鞅用暴力镇压妄图复辟的奴隶主贵族，他这句话还被林彪接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赵良还十分恶毒地渲染秦贵族向商鞅围攻的声势，说商鞅的地位“危若朝露”，要商鞅迅速自动下台，“灌园于鄙”。并建议商鞅“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这个建议，完全是孔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sup>②6</sup>”那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的翻版。可以设想，采纳这个建议，不是取消变法，全面大倒退是什么？商鞅坚决抵制了赵良的反动谬论，坚守岗位，执行正确路线，毫不动摇。正在儒、法斗争白热化、商鞅击退儒家妄图夺权的重要时刻，秦孝公死了。早已与儒家赵良之徒有所默契的失势贵族公子虔一伙，乘机举行反动政变。商鞅用鲜血抗议了复辟的逆流，成为继子正卯、吴起而献身改革的又一个战士。复辟与反复辟的儒、法斗争就是这样的激烈！

章炳麟说：“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sup>②7</sup>。”这些“谗诽”在秦汉时代集中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说他“少恩<sup>②8</sup>”，说他“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渭水尽赤<sup>②9</sup>”。如此等等，总而言之，都涉及到一个暴力专政的问题。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专政是国家的职能。“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列宁：《国家与革命》）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变法的目的是要在秦国建立一种“秩序”，来使新兴地主阶级的既得权利合法化、固定化。也就是说，要用法令的形式，把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新秩序”固定下来。地主同农民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商鞅变法的时代，还是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比之同垂死挣扎的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显然还居于次要地位。商鞅的政权这时候把主要力量放在打击妨碍“新秩序”建立的复辟势力上，放在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刚取得的权力上。这就决定了那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主贵族和附属他们的儒家，就成为政权的主要镇压对象。商鞅与那些反动势力的斗争，是一场进步与倒退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战斗。在这样的你死我活大搏斗中，当然丝毫不能手软。对待那些妄图复辟奴隶制的顽固派，“刻薄”、“少恩”，有什么不可以呢？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当然，我们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与商鞅的专政，有本质的不同，但对妄图复辟的反动派必须坚决镇压，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章炳麟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大力肯定商鞅“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刑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给人足，道不拾遗矣<sup>③0</sup>。”他认为商鞅对反动派的镇压是维护新兴的社会秩序、致力富强的必不可少措施，这个看法是对的。如果要在专政问题上责备商鞅，只能说他还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所以不可能作得很彻底。对权豪贵族，顾忌太多，镇压不力，没有把公子虔一伙顽固分子清洗干净，使这些家伙还有可能伺机反扑，结果使自己惨遭杀害。这就是商鞅留下来的历史教训。

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反法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两千多年来，对商鞅的“谗诽”从来没有停止过。苏修叛徒集团对我们的批林批孔运动惊慌失措，他们炮制大量的反动文章，对先秦法家特别是商鞅进行恶毒的毁谤。他们胡说什么商鞅关于“虱”的概念是“谴责不喜欢他的制度的那些人的精神生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人则是“研究诗歌、历史、音乐、礼，追求善、仁、无私和赋有辩慧，也就是所有能批判地思考的人<sup>③1</sup>”。这真是海外奇谈！

不错，商鞅把宣扬“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的一伙人统统列入了“虱”的范畴<sup>②</sup>。这伙人是些什么货色呢？他们显然是破坏变法、搞奴隶制复辟的儒家。他们宣扬的那一套，是反对商鞅“喜农乐战<sup>③</sup>”、“任法去私<sup>④</sup>”的进步措施的，是要搞“法古”、“循礼”的大倒退的。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以巧言辩说取官爵<sup>⑤</sup>”，妄想向刚刚执政的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反夺权。这是些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死硬派。商鞅曾说过：“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蛆、螾（蝗属）、蚰（蚁属）、蠋（桑虫），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田，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蛆、螾、蚰、蠋亦大矣<sup>⑥</sup>。”把这些“蛆、螾、蚰、蠋”统统列入“虱”的范畴，有什么不对？

什么“精神生活”、“行为准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明白指出：“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所谓“精神生活”、“行为准则”，就是属于道德一类的东西，难道没有阶级性吗？不喜欢商鞅变法的没落奴隶主贵族，他们那种十分腐朽的“精神生活”和十分反动的“行为准则”，为什么不该谴责呢？

什么“研究诗歌、历史、音乐……”？“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商鞅的敌人，宣扬儒家经典，贩卖“仁义”、“孝悌”、“贞廉”、“诚信”，就是妄图从意识形态领域里向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进攻，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以达到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目的。那里有为研究而研究的“纯学术”？那里有超阶级的“诗歌、历史、音乐……”？鲁迅的《狂人日记》曾有这样一段精彩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所吹捧那些“研究诗歌、历史、音乐、礼，追求善、仁、无私和赋有辩慧”的家伙的反动实质！

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叫嚷什么“研究诗歌、历史、音乐……”。你们的“诗歌”不就是呕尽心血歌颂资产阶级的“人性”吗？你们的“历史”，不就是绞尽脑汁美化侵略成性的新、老沙皇吗？你们的“音乐”，不就是神魂颠倒于贴上“人民性”、“现实主义”标签的资产阶级货色吗？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是什么？按照商鞅的律例，搞复辟的统统列入“‘虱’的范畴”。怪不得你们那样“愤慨地”反对商鞅“‘虱’的概念”，原来你们早已经知道自己应该算什么了！所不同者，商鞅那个时代的“虱”，是在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搞奴隶制复辟，而你们今天却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此而已！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是赞扬商鞅的。他曾经写过一首题为《烘虱》的诗，非常生动地描绘他对于那“侵肤”“次骨”的“众虱”实行“火攻”的情景，诗的结尾说：“犹残众虻恨未除，自计宁能久安卧<sup>⑦</sup>！”是的，灭虱一定要彻底、干净。虻子未除，是睡不得大觉的。虻子是虱的继承者，它是要替虱复仇、翻案的。大家看吧，苏修的御用“学者”们现在不是替商鞅所灭的“虱”鸣冤叫屈起来了么？

苏修叛徒集团吹捧“虱”是“能批判地思考的人”，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嘴脸。什么“能批判地思考”？不过是反马列主义的引灵幡，搞修正主义的遮羞布！将近二十年来，你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地思考”得难道还不够吗？正是你们这一小撮无产阶级的“虱”，无耻地背叛了马列主义，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人间地狱。这笔账苏联人民一定要向你们清算的，你们被苏联人民烘烤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 【注】

①商鞅入秦在孝公元年，即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变法在孝公三年，即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见《史记·秦本纪》。

②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③⑥⑧⑩⑬⑲《史记·商君列传》。

④《晋书·刑法志》：“律文起自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

⑤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欲攻取威胁西河边境的秦國小亭，于是以徙车辕、徙赤菽立赏示信，乃一战而拔小亭，见《韩非子·内储说上》。《吕氏春秋·慎小》记吴起以赏债表示信，事亦与此相类。商鞅徙木示信事见《史记·商君列传》。《困学纪闻》卷十云：“商鞅入秦，在吴起死后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吴起之遗智欤？”

⑦此从梁玉绳说，见《史记志疑》卷二十七。

⑧《韩非子·和氏》。

⑨见《史记·商君列传》的裴駰《集解》引《新序论》。《新序》本刘向校理书籍时编辑的一部历史故事资料，今《新序·善谋下》载商鞅事与《商子·更法》、《史记·商君列传》略同，无此论。司马贞《史记索隐》谓“《新序》是刘歆所撰，其中论商君，故裴氏（《集解》）引之”。刘歆是刘向之子，可能裴駰、司马贞见到的《新序》附有刘歆此论，所以谓其作者为刘歆。严可均据此，录此论入《全汉文》卷四十刘歆作品中（严谓今《新序》有此论，盖误）。这种议论是崇拜儒学的刘向、刘歆都可能有的，所以今统称向、歆父子。论中所引孙卿（荀卿）语见《荀子·强国》。四世，指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31年）、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

⑩见《史记·李斯列传》。“六世”是在荀况所讲的“四世”以外，又加上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7年）。“四世有胜”一语，除见《荀子·强国》外，又见《议兵》，是荀况与李斯对话中语。

⑪《韩非子·和氏》，又《问田》。

⑫《诗经·豳风》的农业诗即产生在这个区域。

⑬据《汉书·贾谊传》李奇注。

⑭《史记·秦本纪》。

⑮韩愈：《石鼓歌》，见东雅堂本《昌黎集》卷五。

⑯《荀子·强国》。

⑰《荀子·儒效》把“儒”分别为“俗儒”、“雅儒”、“大儒”，说：“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从杨惊校），以一持万，……是大儒者也。”

⑱又略见《史记·商君列传》及《新序·善谋下》。下面引甘龙、杜挚的话，即以《商子》为主，用《史记》参订。今本《商子》开卷第一篇即称秦孝公之谥，乃“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非商鞅自著，说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零一，但研究商鞅思想学说，这仍是一个重要资料。

⑲《论语·先进》。

⑳《论语·述而》。

㉑《战国策·秦三》记杜挚与王稽将兵攻邯郸，那是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左右范雎为相时事，距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已一百余年，两个杜挚非一人。

㉒见《史记·商君列传》。赵良说商鞅在秦孝公临死前五月，即周显王三十一年（秦孝公二

十四年，公元前338年）。变法至此已二十一年，但《史记》称“商君相秦十年”，司马贞《史记索隐》谓此十年只谓为相，胡三省《通鉴（卷二）注》谓为相当在周显王二十一年（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6年），至此恰十年，盖变法后十一年始为相。

②⑥《论语·尧曰》。

②⑩《礼记·商鞅》。

②⑨《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论》。

②⑪别列洛莫夫：《中华帝制度的形成》，载苏修《历史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五期。

②⑫《商子·斡令》，又《去强》略同。

②⑬《商子·壹言》。

②⑭《商子·修权》。

②⑮⑯《商子·农战》。

②⑰《和王乐道烘虱》，李壁注本《王荆文公诗》卷十五。

## 六 荀况对思孟学派的批判

商鞅变法以后的一百年间①，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出现的前夕。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较量已经把重点由经济基础方面转到了巩固基础的上层建筑方面。政治形势的大动荡就是这种较量的反映。意识形态领域也随着政治大动荡出现了极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在代表进步势力的法家冲击之下，儒家开始分化。当时有“儒分为八”的说法②。“八儒”之中，继承孔丘顽固守旧衣钵的是号称“孔门嫡系”的思孟学派（即“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与之相反，接受法家观点，发生质的变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对思孟学派作有力地批判的则是荀况（荀卿，或称孙卿）。荀况在当时被称为“孙氏之儒”，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儒家，而是一个法家，只不过他把“儒”划分为“大儒”、“雅儒”和“俗儒”，并赋予“大儒”、“雅儒”以名儒实法的新含义③，还没有完全放弃“儒家”这个虚名号而已。因此，荀况对思孟学派的批判，就不能看作儒家内部的派系斗争，而应该看作是他代表法家向儒家进行战斗。“诸侯异政，百家异说④”，是那个时代思想上和政治上进步与倒退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特征，而儒、法两家代表腐朽和新兴两种社会势力开展你死我活的搏斗，则是在那些“异政”、“异说”中形成复辟与反复辟两大营垒的主要内容。“诸侯异政”，不外乎是搞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政治还是搞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百家异说”，也主要是为这两种政治服务的，以儒、法两家为代表的学说。而新兴的封建制代替没落的奴隶制已逐渐变为许多地区的既成事实。“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这是当时的历史使命。荀况代表法家对孔门嫡系思孟学派展开批判，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

所谓思孟学派，就是孔丘孙儿孔伋（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和他的再传弟子孟轲（公元前389——前305）⑤所创立的学派。在荀况的时代（公元前298——前236年⑥），这个反动学派正扩散着十分恶劣而又广泛的影响，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敌人。特别是孟轲，他曾经疯狂地对促进新的变革的法家进行攻击，说：“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⑦。”又说：“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⑧。”这些话，矛头完全是对准提倡农战、致力富强的法家的。所以批判思孟学派，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予垂死的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反攻倒算以有力地